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传统文化的影响与 周作人的文学道路

CHuantong Wenhua De Yingxiang Yu
Zhou Zuoren De Wenxue Daolu

陈文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传统文化的影响与 周作人的文学道路

CHuantong Wenhua De Yingxiang Yu
Zhou Zuoren De Wenxue Daolu

陈文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路 / 陈文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161 - 5223 - 2

I. ①传… II. ①陈… III. ①周作人(1885—1967) — 人物研究
②中国文学 — 近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752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孙少华
责任校对 李楠
责任印制 何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
插 页 2
字 数 420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陈建华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出现很大的变动，特征之一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学科界限开始变得松动起来。记得 2005 年我参加了华东师大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中心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研讨会，会上提出重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加强文献学、版本学的专业训练，也有人认为与古典文学研究比较，现代文学研究显出这方面的欠缺。去年我在苏州大学举办的“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研究”的研讨会上，也提出通俗文学研究要重视文献学与版本目录学的基础建设。这些仅仅就我自己所接触到的现象而言。说实在，人文学科即使不涉及历史研究，哪怕是研究理论的，若要有所创新，必须充分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当然属于文献学的要求，这乃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属于必须遵循的规范。

在现代文学研究或通俗文学研究方面加强文献学、版本学，乃是针对学科的某种现状，或针对某种成见、乃至偏见。我自己有过一次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哈佛，一位朋友听说我在做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就面露可惜，他觉得我应该继续研究古典文学，从事现代文学好像掉了架。当然这是个笑话，但想想也不是个笑话，这种成见到现在大约还是存在的。

对于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大家谈得不少了。当初听到林毓生关于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说法，不由得心头一惊。有的说五四新文学与“文以载道”有一脉相承之处，有的说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是儒家转世，这些已是说得累了。我印象里比较深的是曾经读到郑敏先生的一篇反思五四白话运动的文章，她认为造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断裂，激进主义与二元思维难辞其咎，特别提到当初胡适说白话是“活文字”，文言是“死文字”，跟红卫兵没什么两样。当然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

近时的研究热点。约半个世纪前，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指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征，例举了《赤壁赋》及《浮生六记》等说明与古典文学的渊源关系。后来夏志清有一篇谈徐枕亚《玉梨魂》的精彩文章，说这部满是丽语绮藻，甚至运用六朝骈体的小说传承了自李商隐到《红楼梦》的“伤感—艳情”传统。最近王德威提出“抒情传统”，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更有一番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文学现代性”理论及方法问题的考量。虽然他们谈的是徐枕亚、沈从文，其实是照亮了“鸳鸯蝴蝶派”和“京派”的一大批作家。

我们也可看到近些年来，做旧体诗形成某种潮流，不光年纪大的，也有不少青年热衷于此。有些写新诗的找个山明水秀之处仿效古人“修禊”的美举也时有所闻，这与其说由于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产生的焦虑，毋宁是全球化价值流通打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阂所致。

不过，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我想那是章培恒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倡“古今贯通”，旨在打通学科之间的“鸿沟”、体现文化整体研究的观念。其后他身体力行，在复旦大学古籍所建立了“古今演变”的博士点，而陈文辉的这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路》就是他与谈蓓芳教授合作指导的成果之一。2011年10月我有幸被邀请作外审，读了文辉的稿子我写了以下的意见：

这是一篇优秀论文。资料全面而翔实，分析细腻丰富，富于创见，为古今贯通的学科做出建设性贡献。

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近二三十年来对他的研究成为热点，为学者深感困惑与兴趣的，是传统文学与文化在他的文学思想、政治及文化立场当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在周作人身上传统的渊源与影响深而广，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大多专注于某方面的探讨而难以窥其全豹，而陈文辉这篇论文是最为全面深入的，更值得赞赏的是在处理巨量资料的过程中，陈文辉把周作人置于传统与现代、政治与美学、文学与文化之间冲荡与交汇的具体脉络中，清晰而多层次地揭示他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对于深入理解周作人及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带来启示。具体来说该论文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资料详实。如论文《附录》所示，对于周作人所接触的传统

典籍作了几近全面的清点，且将周的文本放到具体写作语境中加以诠释。论文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以此为基础，这方面发挥了古典文献学训练优势。二、分析细密。周作人的复杂性在于他的思想并非呈现一种直线运动。在他的人生各阶段经常是互相渗透，呈现迂回纠缠的态势，传统在其中起了中介作用。陈文辉的论文以“儒家为体，杂览为用”作为主要线索，在中外、古今、正宗与非正宗、儒家经典与诸子百家、经史与野史笔记之间的“位置交换”来体现周氏思想演变的复杂态势。特别是第四、第五章论述周作人的传统资源从晚明“性灵”到清代“理趣”的转变，更从“王充—李贽—俞正燮”的谱系来说明周氏自敌伪时期的文化选择，是富于创见、令人信服的。三、理论角度。论文摒弃了现代文学研究中流行的“国族想象”或“感时忧国”的诠释模式，而以周的“个人主义”的形成与演变作为主线，对于“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取向具有开拓意义。四、地域视角。这也是这篇论文的亮点之一，如从周的《越中游览记录》发现其推崇晚明小品文的发端，或从大量斋号室名揭示周的家族情结等，皆具新鲜感。

另外我提了几条意见，就不必写在这里了。现在这部即将出版的书稿，已是考虑并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比原稿更为完善自不待言。我当时是匆匆读过，现在可看得仔细些，虽然谈不上周作人研究的专家，但益发相信这本书不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重要面向，而且如论及新文学运动之源起的章节对于治现代文学的也不可 unread。

读罢全稿，不免感慨系之。周氏兄弟为留日一派，同是章门弟子，浸润于革命与复古思潮，也崇尚个人与趣味，其后两人投入“文学革命”，要说加盟于《新青年》，周作人与复古意识决裂，要比鲁迅先进一步。到《语丝》时期，尽管兄弟失和，文学上尚属同一营垒。大革命起，两人分道扬镳。鲁迅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投入革命洪流。他是条硬汉，讲“革命文学”，骨子里仍讲趣味，帮他的胡风，也是硬汉，顶“四条汉子”。鲁迅早逝，跟他的后来受罪，他当然管不得了。周作人不然。他诅咒“革命”与“群众”，谴责南方“清党”，而在北京挂上青天白日旗之后，出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实际上还是拜北伐革命所赐。他心心念念“个人”与“自由”，在“苦雨斋”中熬他的小品老药汤，把文人之

“苦”现代美学化，可谓炉火纯青，其情亦可哀也已。然而到日本人来了，又出任这个那个的，仍不免有所依附。文学与个人在现代中国的遭遇，周氏兄弟可说是一面镜子。

有趣的是三十年代之后周作人自视为李卓吾同道，其实与李卓吾怎么比？皇帝要放他出狱，给他自由，他不要，在狱中了断自己，为个人赢得尊严。周作人是一味的软，所谓只欠一死，这么说太毒。如他自言，之所以不愿南下，主要是家眷牵累，一家人都靠他，包括他母亲和鲁迅的妻子。因此他对鲁迅和许广平颇有微词，认为鲁迅没有尽到儿子和丈夫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周作人的家庭本位是非常传统的。他称赞李卓吾，限于同情女性的方面，一半是，一半不是。李卓吾脱离官场后不回老家，只身在湖北坐而论“异端”之道，个人得相当彻底。

我对周作人印象不太好，与他跟“鸳鸯蝴蝶派”的一段公案有关。1918—1919年间他和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唱双簧，指斥“黑幕”小说，也攻击到徐枕亚的《玉梨魂》，说这部小说是“鸳鸯蝴蝶派”。殊不料这顶帽子后来被不断加码，到1960年代的新文学史里成为“反五四逆流”的恶谥，涵盖了所有民国“旧派”文学。且不说其糟糕的影响，可注意的是他们都把《玉梨魂》与袁世凯的复古尊孔挂起钩来。钱说：“到了民国成立，反来提倡复古，袁政府以此愚民，国民不但不反抗，还要来推波助澜，我真不解彼等是何居心。”周作人说：“到了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作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地流行。”这么说不合事实。《玉梨魂》于1912年连载于《民权报》上，次年出版单行本，风靡一时。其时袁世凯的“复古”企图尚不明显，而办《民权报》的大多是支持反清革命的南社成员，天天骂袁世凯，被袁视作眼中钉。《民权报》1914年被迫停刊，而徐枕亚是该报记者之一。

《玉梨魂》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一，章培恒、夏志清等先生在思想艺术上对它作了高度评价。回到当时脉络里，周、钱不分青红皂白同声指斥《玉梨魂》，急急乎表明自己站到新文学白话的立场，两人本来属于章门“复古”营垒，因此大有反戈一击的意味。实际上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运动，写的文章都是文言，到次年该刊方明确使用白话。同样周作人在1917年6月仍用文言翻译了苏罗古勃的短篇小说《未生者之爱》和一组寓言，准备收入重刊的《域外小说集》里。

这部小说集原是他与鲁迅一起在日本翻译编辑的，语言上古色古香，完全是章太炎的语言国粹论的产物。虽然袁世凯已死，但照钱玄同的说法，对于“复古”仍在“推波助澜”，所谓“是何居心”的责问也适用于《新青年》和他们自己头上。周作人把《玉梨魂》等看作“国粹的小说”，这一点倒是的，须联系到十余年前由黄节等人创办的《国粹学报》，领军人物是章太炎。黄节等本属南社，《国粹学报》直接影响到南社成员的文学创作。《玉梨魂》以古典诗学、甚至以骈文来写小说，这一“国粹”小说，可说是集抒情传统之大成，是一个“纯文学”样本，从而使小说占了现代文学的龙头地位。

从思想源流来说，《玉梨魂》和周作人信奉过的“复古的革命”其实是殊源而回归，在三十年代还撰文表彰黄节和《国粹学报》；但他攻击《玉梨魂》，可能对于徐枕亚的反袁背景并不清楚，但关键还在于它的“艳情”，含有对所谓“鸳鸯蝴蝶派”，实际上对上海新兴的都市“通俗”文学的敌视。对“艳情”的排斥见诸1915年梁启超的《告小说家》一文中，即针对上海的文学市场，严厉指斥“艳情”和“侦探”这两类小说，斥之为“诲淫”和“诲盗”。周作人分享了这一卫道的焦虑，也包含趣味上对于“才子派”文学的排斥，这方面周氏兄弟是一致的。如刘半农表示了对于晚明“性灵派”及袁枚的欣赏，遭到《新青年》同仁的批评。鲁迅后来回忆说：“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不容易给我们骂掉了。”

属于个人趣味或成见尚不打紧，从鲁迅的话看出在《新青年》内部形成某种雅俗分界的共识。钱玄同说金圣叹“用肉麻的思想去批《西厢记》，满纸‘胡说八道’”，也正是这个意思。这颇如李渔的小说《合影楼》里所描写的，好似“风流才子”与“道学先生”的对立，即一种在清初形成的反对晚明浪漫之风的思想形态。事实上新文学运动在“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下，高等教育的文化资本与国家权力共谋，已显出排斥“通俗”文学的倾向。1915年7月民国政府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因袭了前清皇朝对戏曲小说加以取缔、禁毁的政策，其时袁世凯仍在当政，应当属于袁氏限制言论自由的政策部分。同年9月鲁迅担任该会小说股主任。在他主持下研究会确定了对现有出版小说的审查标准，所有小说被分成八类，每类分上中下三种。在1916—1917年受审查的书刊达六百余种，将《游戏杂志》、《香艳杂志》、《眉语》等杂志列为下等，最

后遭停刊的是《眉语》，理由是“状态猥亵，意旨荒谬，几不知尊重人格为何事”等。

别的不说，《眉语》的主编高剑华与几位编辑都是女性，单这一点在现代文学史上即有重要意义。如果以停刊理由的眼光来看已出版的十八期《眉语》，该杂志以“艳情”小说为主，以裸体女郎作为封面，常刊登中外爱情图片，男女姿态和表情较为亲昵。另外有时发表高剑华和她丈夫许啸天之间的情书之类，有些肉麻示爱的表达，其实在宣扬一夫一妻的爱情观，比《浮生六记》中“闺房记乐”进一步开拓了私文学领域。同样的，1918年秋通俗教育研究会发表了《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接着周作人和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攻击“黑幕”小说的文章，也是在密切配合官方对上海通俗文学市场的干涉。

这里道及有关周作人的这段故实，是在阅读陈文辉这本书时所产生的点感想。想说明的是民国时期不同文学流派在印刷资本主义机制中处于互相竞争的状态，关注新文学方面与通俗文学的关系，能对文学场域作较为整体的考察，涉及南北地缘文化、阶级、性别等话题，也可进一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谓“新”、“旧”的问题，那么周作人尤具典型。如果把这位“老新党”与包天笑、周瘦鹃作些比较，孰新孰旧，会很有趣，大约可以破除一点概念的迷思。

文辉这本书清晰而细致地勾画了周作人与小品文的身份认同几经曲折，实际上是以晚明文学作为批评的标尺，在分析被认为代表新文学运动“思想革命”的《人的文学》一文时指出：“最终落实对人性的解放时，还是需要对人的欲望的克制，由此可见，周作人在《人的文学》观念模糊中的温和态度，实质是一种保守性。”又如谈到1925年的《国语文学谈》时认为“有让士大夫统系的文学取代通俗文学统系在文学史的主导地位的趋势”。这些都能一针见血，因此说周作人后来的“由明文到清文”思想退步也是顺理成章。

2008年底，章先生要我以七十年代的新诗发展为题，给复旦古籍所作讲座，另外为博士生做点指导，由是认识了文辉。他思想活泼，虚心敏学，志向高远，跟我讲起他求学过程的一番曲折，想起自己的过去，颇有心通处。后来又见他，却在2011年6月哀风凄雨痛悼章师之时。那几天我在复旦，文辉告我他组织了一个烛光晚会，于是晚上我去了光华楼，有感于动人的一幕，写了一首散文诗。几天之后我已回到香港，接到文辉的

邮件说，他在为复旦校刊编一个纪念专辑，我把这首诗传了给他，刊登在那个专辑上，此即《烛光悼章师有感》：

难忘的一幕，神圣而温馨。夜色里，每人怀里揣着一朵烛光，三三两两走下石阶，围成一颗心，映照出你，生命中永恒的一刻，优雅而慈祥。

不知是谁的创意，把烛光放入塑料纸杯里，顶住了风。他们听过你的文学史课，文学史里没有塑料纸杯。你的人性之光点燃，在平凡里创造奇迹。

桃李满墙的校园，有过这样的烛光。但不曾有学生来一瓶酒，把你当作酒友。这样的烛光以后还会有，但只有你，与酒的传奇、悲剧的精神同在。

见我踟躅于一旁，老师招呼我过去，笑问：你手中捧着的是什么？我看看手中，自以为捧着他的光环，此刻已经化成片片鸟翼，消失在夜空里。

来，和大家喝一杯。让我们举杯，为未来干杯！老师显得那么年轻，我摸摸自己的小胡子，好不容易养起来的，也消失了。

“把你当酒友”指的是文辉。就像他在本书《后记》里说的，他在章师面前不拘形迹，而心灵感通。此书定稿后，文辉请序于我，虽然我觉得古籍所的谈蓓芳等几位老师为这部论文倾注了不少心血，由他们来写序是更为合适的。既然文辉不拘常理，我也不得不应承了。是为序。

2014年3月22日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荣誉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

序 二

黄开发

大约从 1920 年代中期开始，周作人脱离“五四”思想革命的主流路径，其写作和思想中的传统成分逐渐增多，并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1930 年代初，左翼作家对他进行了挾伐，有代表性的如许杰在《周作人论》（1934）中所说：“周作人是一个中庸主义者。他虽然是一个新文坛上的人物，但实在却是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因为他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所以，他的思想的出发点只是一些浅薄的人道主义。”“因为他是一个绅士，是一个穿上新的衣裳的士大夫，所以，他的意识，是到处同封建思想结合着的。”

许杰的观点，如说周是“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等，对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周作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左翼文学观念发展成为具有排他性的主流，许杰式的论断成为了定论。一直到新时期，甚至到现在，这一观点仍余威尚存。舒芜在 1986 年发表的《周作人概观》中认为，周作人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他“不能克服文化传统中的消极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调节特性所凝成的中庸主义”。“周作人从反封建的前列，一退而为封建的异端派（如明末的山人名士）的护法，再退而与封建妖孽汉奸政客同流，其间一条曲径通幽，就是中庸主义。”

随着研究的深入，1980 年代中期以后，舒芜、钱理群等主要的周作人研究者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修正了自己对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观点，对周氏思想所表现出的现代新质及其价值有了新的评价。舒芜在与我的聊天中，多次表示要写一篇周作人与古代文学的长篇论文，并且已经准备好了资料卡片。记得读他在《读书》上连载的《“桐城谬种”问题之回顾》（1989），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谙熟古文的底细，举重若轻，自由穿梭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我一直期待着他把这样的研究发扬光大，为深化周作人

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再奠定一块基石。然而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他的这个夙愿一直没有实现。后来他骑鹤西去，其未竟之作最终成为了一个遗憾。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研究者对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新论。以前的研究者习惯给周作人贴上诸如“封建士大夫”之类的标签，《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似乎是支撑这一论点的典型文本。旅美学者张旭东在《现代散文与传统的再发明——作为激进诠释学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载《现代中国》第 12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4 月）中提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对中国文学的过去经验最不‘伤感’和最不‘怀旧’的作品之一。”“周作人从来不曾‘倾向传统’，假如把这个‘倾向’放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衡量。恰恰相反，他总是倾向于现在，以至于他急切地想在理论上定义什么是‘新’，这个‘新’可以充分地把‘旧’归为已有，并把自身建构为现在的传统。”

然而，关于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成果，不论观点如何，绝大多数还停留在印象式的结论上，缺乏沉着、全面的实证研究。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少见的学术难题。仅从知识结构上来说，研究者需要兼具旧学的根基和新学的修养，特别是需要有思想史、文学史、民俗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加入其中。

近年来，周作人研究中较为表层的问题大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裹足不前，越来越制约着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批年轻的研究者知难而上，试图摒弃成见，以一种复杂的态度从周作人自身出发进行专门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都受过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其中又大都以此为题作了博士论文。去年夏天，我名下的研究生何亦聪也以论文《周作人与中国思想传统》获得博士学位。已经出版的专著如哈迎飞《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胡辉杰《周作人中庸思想研究》等，都有了较大的突破。现在本论题的博士论文已将近十篇，陈文辉《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道路》可谓后起之秀。

与多数研究者不同的是，陈文辉是带着自己的专业优势参与到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来的。其他研究者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他们往往是先选择了学位论文的方向，然后再来“临时抱佛脚”补充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的，这样对周作人这样旧学根柢深厚、新旧错综的

大家来说有时难免笼统和肤浅之嫌。文辉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是章培恒、谈蓓芳两位先生的高足，硕士研究生期间在浙江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元明清方向。正是由于自己古代文学的专业背景，他选择了一个坚实的切入点：考察对周作人思想和文章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传统典籍。这是一项别人没有做过的重要的基础工程。向来论周作人与传统文化关系者多矣，但殊少有如陈文辉之肯下功夫者。这从书末所附《周作人早期所读传统典籍书目简编（1890—1906）》可见一斑。书目分丛书、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卷帙繁多，实在令人感佩。作者基本的研究方式是传记式的，主要从周氏日记中寻找线索，并与以后的文章和书信相印证，来解说周作人思想和人生道路。考察周作人所受的影响，就像考察一条大河的水源。水源是由大大小小的支流构成，而众多支流的汇合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河流的性格。一本本书差不多就是一条条支流的标志。作者找到了主要的支流和一些常常被人忽视的溪流，初步绘制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周作人所受传统影响的“水系图”。该书对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不一定是大面积的突破，而在于大大充实了对具体问题和历史嬗变的研究，进一步夯实了研究的基础。

陈著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以传统文化典籍为标志和线索，通过实际勘察，讨源溯流，丰富和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周作人与晚明小品的关系是论题的主要部分之一。由于1930年代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推崇和引起的文坛纷争，一谈到传统的影响，人们通常会首先想到晚明小品。如果眼光局限于周氏结集的作品，可能会仅仅把他与晚明小品的关系上溯到1920年代中期，而忽视其早年与晚明小品的关系。陈著找到了源头，让我们看到了周作人与晚明小品更为久远的关系。作者通过丰富的资料，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周氏个人思想的动因，清晰地勾画了在一个较长时段中周氏与晚明小品关系的流变。民国初年，作为章门弟子的周氏兄弟受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的影响，辑录和刊刻《会稽郡故书杂集》。周作人在刊刻《会稽郡故书杂集》的过程中，开始收集历代越人著作。其中，游记兼具山水与人文之两美，张岱《陶庵梦忆》、王思任《文饭小品》等受到周作人的喜爱。然而，周作人与张岱等晚明作家的关系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1897年，他住在杭州花牌楼陪侍狱中的祖父，在那里初次读到并喜欢上了《陶庵梦忆》。后来新文学兴起，在1920年代初期讨论如何建设“国民文学”的理论背景下，周作人发表系列文章，

通过“地方文艺”的名目，逐步将集中了个人性情、民族情感、乡土特色、文人散文创作诸多元素于一身的“晚明越中文人”引入文学史主流。1926年到1932年，是周作人“寻找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第二阶段。在本阶段，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标志，周作人把他的乡贤晚明越中文人逐渐与公安竟陵派联系起来，然后视其为公安竟陵派的融合者和集大成者。

文辉的追根溯源对深入剖析周作人的一些思想和人生道路问题颇有助益。“五四”高潮过后，周作人与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思想产生了动摇和混乱，两三年以后他形成了自己稳定的人生哲学。这种新的人生哲学明确地表述在他的诗歌《寻路的人》和散文《生活之艺术》中。我以前在研究中重点探讨过这一问题，提出他最终选择的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生活之艺术”中所包涵的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体验及其选择，对理解周以后的思想和散文写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人生哲学，我在论述时只是蜻蜓点水式地提及周接受了葛理斯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典型的人生态度相通的“生活之艺术”的观念。现在参照陈文辉的研究，我明显地感到自己对周作人从“混乱”到秩序的转变过程中传统的深层机制缺少注意。文辉提出，周作人将儒家“中庸”作为他的“体用”之说的“体”，完整地提出其“托古改制”的思路，并进行了细致周详的论析。作者经过前文对周作人与传统盘根错节关系的充分铺垫，再结合周氏的作品提出这样的论点，是令人信服的。

文辉不仅纵向地找到周作人所受传统影响的嬗变，而且还能够勾勒出横向的知识网络。如他在第五章中对周作人构建“三贤”谱系的论文就是显例。作者所称“三贤”，指的是周作人最为称赞的三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充、李贽和俞正燮。前二者是著名的异端，后者则以博识的学者身份见称。文辉在周氏人生和思想的道路中，在其与同时代人的互动中，梳理出了他与三人关系的始末。这里仅以李贽为例。周作人最早提及李贽是在1926年10月，然而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小事件。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该年9月访问通州的李贽墓，引起了风波，周作人撰写有关此事的“读者来信”，首次提到李贽。周氏1932年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没有谈到李贽，其原因是当时学术界中对晚明文学思潮与李贽的联系认识不足。在1930年至1937年期间，李贽先是作为晚明的通俗小说评点者，后又作为

以尺牍为特色的晚明小品文作家，最后才是作为思想家，渐次进入周作人的视野。周作人对李贽著作的直接了解和阅读，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中后期。1934年，随着朱谦之对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李卓吾年谱》的翻译，以及容肇祖等人的相关研究，公安竟陵派与李贽的联系才为人们所认识。周作人吸收了当时学术界的李贽研究成果，加上老友钱玄同的帮助，李贽才真正为他所重，获得高度评价。周氏在自己的文字中将其作为晚明文学的思想领袖，则首见于1937年4月的《谈文字狱》。到了1939年1月发表的《看书偶记·印书纸》中，周作人则首次明确了“三贤”的说法：“王仲任为吾乡先贤，素所景仰，尝谓与明李卓吾清甫理初同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这样对周作人与三个思想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条式的勾勒，而是立体地呈现。

应该老实承认，我和文辉对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基本判断并不一致。文辉似乎更突出传统投射在周作人身上的阴影，强调周作人对传统的“回归”。而我则以为，周氏始终是以一个现代启蒙主义者的眼光去勘察、区分、阐释传统，并以传统来烛照现实。他谈越中乡贤，谈王充、李贽、俞正燮，都有其超越个体的重要意义。他后期使用了古老的话语形式，这虽是从儒家思想传统中借取的策略，但似旧而实新。就其主要的、积极的方面来看，他与鲁迅、胡适始终代表着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三种存续方式。不过，周作人的思想和人格到底属于“传统”还是“现代”，也许最终也不会有一个黑白分明的定论，但研究者们从实际材料出发，从各自的学理出发，都会把握到某种“真实”。在不同观点形成的张力中，我们可以更多地接近真实。我虽然与文辉的观点有所不同，但读文辉的书，却颇受启发，丰富和深化了对不少问题的认识。其实，文辉也在结语中谈到了周作人思想和创作的现代性意义：“首先，周作人的思想和文章中对普通事物和普通人的重视，这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付诸实践，真正跟上近代世界的潮流。”“其次，周作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非正宗的别择’，从本质上说，是以个人的趣味和眼光，对为道学与八股所笼罩的传统文化的去魅和重构。”他点出周作人面对传统时的积极主动的态度，只是与文章主体论述的逻辑上的过渡和关联不够。

相比较而言，文辉更重视周氏与传统文化的“同”，而非“异”。他提出了不少新鲜有趣的观点，惜乎有时论证不足。比如，人们容易注意到周作人骂八股文，把八股文与太监等视为中国文化的恶疾，那么周作人文

中有没有八股“尊神”的影子呢？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写道：“周作人文章所受到八股、策论的直接影响，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事实上，周作人很多文章，经常从旁人作结的‘但是’之后起笔，作为文章论述的出发点，这便是对八股文的借鉴。”这里只是一笔带过，而没有进行论证。在中外文章中，这种手法都并不鲜见，从“但是”以后起笔，很难排除其他的可能。

文辉在来信中表示，想以周作人日记作为线索，以周作人的阅读与翻译情况来研究外来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再写一本《希腊之光：周作人的知识形成》。这将会是文辉对自己周作人研究疆域的重大拓展。通过周作人与外国文化关系的研究，作者对周作人认识将会更有整体上的贯通。对此我是很期待的。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素少研究，又客居北欧，手头上没有相关资料，说得不对的地方，还望读者和文辉批评。

2014年1月28日于丹麦奥尔堡寓所

目 录

绪论	(1)
一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1)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5)
三 选题缘起、学术意义与研究思路	(10)
第一章 求学时期(1885—1911)的周作人	(15)
概说：“儒家为体，杂览为用”的传统文化	(15)
第一节 “古老的忧惧”	(20)
一 来自儒家经典之“忧”	(23)
二 来自野史笔记之“惧”	(39)
三 山会风土人情与周作人的民族情感	(44)
第二节 “传统的虚无主义”	(52)
一 《庄子》与周作人的道家思想	(53)
二 《投身饲饿虎经》与周作人的释家思想	(64)
三 金圣叹“蜉蝣世界之一消遣法”与周作人的无意识 存在主义	(71)
第三节 “外国的人道主义与革命思想”	(82)
一 周作人与维新派梁启超、谭嗣同之关系	(84)
二 周作人与国粹派章太炎、刘师培之关系	(89)
第二章 归国乡居(1911—1917)的周作人	(102)
概说：作为“白日梦”的传统文化	(102)
第一节 从异域的故国到故乡的往昔	(108)
一 异域的古昔中国	(108)
二 《会稽郡故书杂集》与周作人的乡贤著作收藏	(112)